

周向军 陈德金 陈家付 主编

探索与创新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周向军 陈德金 陈家付 主编

探索与创新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索与创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周向军等主编.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607-3861-1

I. 探…

II. 周…

III. 改革开放—中国—文集

IV. D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2714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787×980 毫米 1/16 18.5 印张 390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实践探索篇

实践探索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3)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思想解放的新起点	(8)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12)
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6)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出路	(20)
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演进	(23)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探索政治现代化模式的经验研究	(27)
我国当前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探讨	(31)
从社会公正角度理性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	(35)
改革中的企业信用问题探析	(40)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虚拟经济发展	(4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邮政普遍服务补偿机制的变迁及对策研究	(49)
走出委托—代理关系困境 提高劳动资源配置效率	(54)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	(57)
土地承包经营与社会稳定	(61)
农民增收转型及启示	
——以山东省2003年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为例	(66)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化复兴历程的再思考	(71)
关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思考	(75)
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考	(79)
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83)
中国外交三十年的发展与变化	(87)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及其价值评估	(92)

超越历史、面向未来——谈中日关系	(96)
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探索及其主要成果	(100)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105)
利益群体的多元化与党的执政理念和方式创新	(109)
以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推进党的建设	(112)

理论创新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发展问题的探索和回答	(117)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21)
党的十七大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	(125)
指引重大社会变革的伟大理论创新成果	(129)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发展	(134)
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条件	(138)
论坚持社会主义	(143)
探析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	(146)
以人为本的理论解读与实践阐释	(151)
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路径	(155)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初探	(159)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美	(16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时代意蕴	(168)
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172)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研究综述	(17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180)
浅谈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184)
全球化视域下社会主义改革问题探析	(187)
中国近代社会民主发展的历史反思	(191)
学习经典作家 不断解放思想	(196)
社会思潮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199)
新一轮解放思想的特点与要求	(2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公平理论初探	(206)
努力推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2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方法论解读	(215)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思考	(218)

教学改革篇

以科学发展观审视胡适的科学教育思想	(223)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专业课教学探微	(22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231)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写在纪念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三十周年之际	(235)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与资源型网站建设	(238)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 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力	(242)
新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党支部建设的新探索	(246)
和谐网络建设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250)
简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的心理健康教育	(254)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25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26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理论探讨	(266)
和谐文化背景下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考	(27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德育建设的历史轨迹与经验启示	(274)
以学生为本 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278)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全面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282)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对高校党建工作的作用	(285)
后 记	(288)

实践探索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方面的每一项重大成就，在基本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每一步拓展，都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取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重新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议题，也是它的重大历史功绩之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有其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的内在逻辑和依据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80 多年历史表明，什么时候遵循这条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胜利前进；什么时候脱离这条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就在于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背离了这条思想路线，导致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国民经济遭受了重大损失。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被粉碎无疑是结束“左”倾错误思想指导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壮举。伴随着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的逐步深入，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却遇到了严重障碍。这一方面是由于十年“文革”所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清除，同时也由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他不仅不积极清理长期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反而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路线。

1976 年 10 月 26 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部汇报时就指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正式概括提出了华国锋关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

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批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继续强调“两个凡是”,同时关于当时的政治焦点——恢复邓小平工作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他说:“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问题和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是坚决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①很明显,这是阻止邓小平复出工作,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实质是要竭力维护“左”的路线,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方针。

华国锋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极大地阻碍了各方面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我党正确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确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二

正确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确立,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引起全党上下的不满和强烈反对。首先批判“两个凡是”的是邓小平。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负责人的谈话中,明确批评“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同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着重谈了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②。他认为,必须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正确理解毛泽东说过的一些话,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多次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一命题,其政治指向是十分明确的,它要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要求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开来,引导人们走出思想误区。

随着对“完整地、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命题的反复阐释和广泛宣传,人们的思想逐渐活跃起来,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要求从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呼声愈来愈高;而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领导人却继续压制、拖延、阻挠平反和纠“左”工作的进程。这种局面,促使人们从更高层次来思考“两个凡是”的认识论根源,从根本上弄清判断思想和路线是非的标准,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由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相继转载。此文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引起了强烈反响,既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也遭

^① 《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到一部分人的非难和反对。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在涉及是否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原则问题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于5月底首先表态明确支持这场讨论。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讲话，精辟地阐明了实事求是的观点，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①他呼吁：“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②这篇讲话有力地支持了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地区时又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和指导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速扩展为全国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和个人崇拜的束缚，打碎了“两个凡是”的枷锁，开始把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现代迷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它揭开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序幕，直接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这必须以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基础，因而恢复和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议题。为此，会议首先讨论并通过了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总的指导方针，认为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才能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才能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全会还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全会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③十一届三中全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③ 《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并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贯通起来，揭示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内涵，使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更加丰富了，这是对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继承和发展。

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从根本上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这就为纠正多年来“左”的指导思想，在全国开始全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奠定了思想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下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中央也从此开始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始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政治方面，中共中央经过切实调查研究，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全国复查了大量冤假错案，积极调整了各方面社会关系，落实了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各项政策，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的安定团结，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组织方面，进一步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并着手进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废除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并逐步实现各级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从而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获得了有力的组织保证。经济方面，1979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提出用三年时间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从此，经济调整工作在全国大规模展开。总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开始蒸蒸日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党的基本理论、确立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开辟了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式的理解，从实际出发，通过分析国情，得出了一系列新结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经济，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必须改革不合理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科技及文化体制；要在经济技术相对落后、资金不足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党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制定了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伴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的认识愈益深化，观念不断更新，实践不断创新，并最终开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我国改革和建设的每一项成就，思想理论上的每一个成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每一步拓展，都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取得的。在新世纪的征途上，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深入，必须继续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作者: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书波)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思想解放的新起点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急需大解放，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①，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思想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此中国进入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时期。

一、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选择，人民迫切要求突破旧模式的束缚，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围绕是否定“文革”的同时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还是秉承“左”的教条和对领袖的盲目崇拜，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老路子，中国出现了徘徊局面。在这种形势下，要前进和发展，就必须解放思想，澄清各种错误的思想理论认识，从而实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②。

1.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这是针对当时中央领导人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论断而在哲学层面上展开的一场论争。这场论争揭示了“两个凡是”原封不动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继续走“文化大革命”老路的实质,批判了其理论上的虚伪和谬误,明确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③,鼓励人们打破思想上的条条框框,勇于实践,在实践中大胆求变。这就打破了“两个凡是”对人的思想禁锢,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成为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④。

2.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为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央工作会议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行经济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上澄清了认识，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进一步检讨了党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对“两个凡是”取得了绝对胜利。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适时地把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摆在了第一位，从而把握住了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促进了转折的实现。讲话彻底冲破了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③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载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的“左”的思想禁锢，成为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思想解放的新起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思想解放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思路，在中国面临走向何处的历史关头，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从而推动整个国家走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新起点。

1. 从全会议程来看，“解放思想”贯穿会议始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指导方针，各组采取集中阅读文件或安排讨论的办法，在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后闭幕。关于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体现在《讲话》和《公报》中。

《讲话》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着重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讲话始终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主要是解放思想，即关于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条件以及怎样解放思想的问题。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邓小平的讲话成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①。

从《公报》来看，邓小平讲话的思想被充分吸收，并以党内决策的形式确定下来：全会基于“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的整体判断，果断地决定“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②，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党的政治路线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政治路线上解放思想；全会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③，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重新确立，一方面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另一方面本身突出了“解放思想”；针对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在组织上作了相应的调整，在组织上重新启用“文革”中受压制的一大批老同志，让他们作为改革的中坚力量进入中央机构，大大加强了改革开放的领导力量，这是组织路线上解放思想；此外，全会决定“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地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④，这就在发展方略上实现了由封闭自守到改革开放的解放思想。

综上所述，全党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各个方面实现了解放思想，“解放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1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 页。

思想”的成果以党内决策的形式被确立下来而成为全党共识。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充分发挥了解放思想的先导作用和强大动力,才在会议上作出了一系列具有转折意义的伟大决策,并以此为起点在此后的实践中逐步开辟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子来。

2. 从全会的地位来看,全会是改革开放新时代思想解放的起点

其一,从思想解放的历程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具有起点意义的一次关键性大会。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历史。如果从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其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标志着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社会层面全面展开;中央工作会议把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引向党内,社会层面的思想解放转变为执政党的思想解放,会议在重新确立党的路线、开辟新的发展道路等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是思想解放取得的初步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党内决策的形式把党内共识确立下来,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承继了思想解放的初步成果,打开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子。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把党的思想解放推向高潮,使全党思想获得了彻底解放。此后的历史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框架下不断推进,人们的思想不断地得到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其后三十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解放思想,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正因为如此,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视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解放新起点是站得住脚的。

其二,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上看,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起点。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征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邓小平理论经过三个阶段逐步形成: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从十二大到十三大,这一理论逐步展开,形成基本轮廓;从十三大到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邓小平理论最终形成了科学体系。此后,我们又取得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十七大把这些理论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邓小平理论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以后的理论都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起点。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包括中共历史上一系列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拨乱反正;提出改革开放的新方针,实现农村包产到户和沿海经济特区两大实践突破到十二大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①,改革开放逐步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们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路子。

^①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综上所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探索的起点,也必然成为新时期党的思想解放的新起点。正是有了这么一个高的起点,我们才真正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墨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这三大转变,才有了后来的多次思想大解放。

(作者: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孙云燕,孙颜民)